

The Dilemma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Age of Machine Translation: Reconstructing Human Values Under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AO Yix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China

Received: April 10, 2025

Accepted: May 12, 2025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CAO Yixin. (2025). The Dilemma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Age of Machine Translation: Reconstructing Human Values Under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 031–03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3.004.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3.004.p>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Youth Project Grant of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in 2021: (No. GD21YWY02), and the Research Grant of Talent Introduction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 2022 (No. 2022RC008).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nsion between instrumental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explores reconciliation paths. It finds that traditional paradigms, overly reliant on technologism, fail to address demands regarding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labor value, and humanistic dimension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The study argues for a new framework integrating technology philosophy with humanism, involving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ty and humanistic value, expanding translation subjects to includ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deepening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labor in technological contexts. This shift provides a meta-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aids in value positioning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mid technological change.

Key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CAO Yixin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Education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pedagogy. Her email address is 201910091@oamail.gdufs.edu.cn.



機譯時代的翻譯理論發展難題 ——工具理性關照下人類價值的重建

曹藝馨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

摘要:在人工智能重構翻譯實踐的語境下,本文探討翻譯理論研究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結構性張力及其調和路徑。通過歷時性考察翻譯學科發展脈絡與共時性分析技術現象發現:傳統理論範式因過度依賴技術中心主義,已難以有效回應智能時代對翻譯主體性、勞動價值及人文維度的理論訴求。研究指出,翻譯學的可持續發展亟需構建技術哲學與人文主義相融合的新框架,應重構技術工具性與人文價值性的辯證關係、拓展包含人機協同的翻譯主體範疇、深化技術語境下的翻譯勞動本質研究。這種範式轉型不僅能為跨學科研究提供元理論支撐,更有助於實現翻譯學科在技術變革中的價值定位與理論創新。

關鍵詞:翻譯理論;神經機器翻譯;大語言模型;工具理性;價值理性

基金項目:廣東省社科規劃 2021 年度項目青年項目「產業擴張與技術革新下譯者主體性理論新建構」(GD21YWY02),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2022 年度引進人才科研啟動項目「機譯擠位下譯者主體性凸顯研究」(2022RC008)。

人工智能的發展讓翻譯研究領域出現技術中心主義的風潮,顯露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與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的失衡態勢。首先,價值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宣導暫時並不能解決翻譯從業者對「人工智能取代論」的恐慌,行業必須面對人工智能翻譯效能不斷增強、普通譯者的主體性和話語權在社會中逐漸喪失的事實。其二,對價值理性的追求暫時囿於對倫理的追求,而對倫理的追求又囿於對社會規範的追求;這與價值理性原本更加廣泛的、終極信仰層面的涵義是相悖的。其三,人工智能驅動下的翻譯研究多屬於經驗和現象梳理以及未來規劃,幾乎摒棄了前幾十年翻譯理論的成果,導致了理論傳承和後續發展的乏力。

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應該意識到,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衝突是一個現代性的根本問題,而不是一組人工智能時代才出現的矛盾。這組矛盾貫穿了現代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發展,也自然影響了現代翻譯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範疇。若想更好地理解當前的人工智能崇拜、人類譯者主體性喪失等現象,若想在新技術語境下更好地繼承現代譯學的成果,都應該回到這組矛盾的定義、發展,及相關表徵之上。本文對此進行梳理和闡發,呼籲學術界、產業界結合,共同達到翻譯研究、生產領域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新的平衡,實現學科的可持續發展。

一、人工智能驅動的翻譯系統與人類譯者的異化勞動

人工智能翻譯技術主要包括神經機器翻譯(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下文簡稱 NMT)和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下文簡稱 LLMs)。機器翻譯發展至今約 80 年,經歷了從依賴人類經驗的語言學規則到以資料和模型為主導的轉變。20 世紀中葉見證了機器翻譯基於語法規則的階段,以及基於平行語料庫

和實例的階段；這前兩個階段以人類理性主義為主導(劉洋,2017),機器翻譯主要依賴於人類語言學家總結的語言規律和規則。1990年代進入基於詞對齊、短語對齊,以及句法統計的統計機器翻譯階段;2010年後進入基於深度學習的神經機器翻譯階段(*ibid.*)。這後兩個階段是以機器的學習和經驗為主導的階段,注重以資料為中心,通過數學模型描述語言的轉換過程;它們以大規模多語言文本為資料,以機器為主體進行自動訓練。近年來,以 GPT 為代表的 LLMs 通過海量資料深度學習,提升了翻譯效率和品質,拓展了應用場景,如圖像與文本融合、語音翻譯、智能客服、教育輔助和醫療翻譯等領域,推動了機器翻譯的大眾化應用。

人工智能驅動的翻譯系統對人類智能提出了直接質疑和挑戰。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看,在經驗總結能力、學習遷移能力以及即時工作效率等方面,人工智能往往展現出顯著的優勢。與此同時,人工智能還引發了大規模的產業升級。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並存的背景下, NMT 憑藉其高效性和低成本,使翻譯服務在國際政治、文化輸出以及本土化需求等領域的應用範圍進一步擴大。翻譯逐漸成為流水線上的標準化產品,人類譯者的主體性被進一步削弱,淪為翻譯生產環節中的一個普通部件,難以再像前人工智能時代那樣全面掌控翻譯勞動的全過程。翻譯勞動被抽象化、異化,譯者不再有機地融入其中^①。

翻譯生產環節的割裂以及人類譯者的異化勞動,主要體現在對翻譯工具屬性的極致追求上。無論是人工智能領域還是語言學領域,研究多集中于如何提升翻譯的效能。一方面,研究聚焦於如何將人類智能融入人工智能的學習過程,從而提升其學習效率;另一方面,研究關注如何更好地將人工智能應用於市場。因此,大量研究將句法結構、語義結構、文本類型、神經語言學等語言學知識融入 NMT 的學習過程中(Belinkov et al., 2017; Hahn & Baroni, 2019);同時,也有基於知識、應用、思維能力的人機協同翻譯素養研究(楊豔霞、陳瑩、魏向清, 2025)。LLMs 的興起延續了這種對工具屬性的追求,例如,對技術效率的注重推動了對「提示詞」(Prompt)的研究(Lu, Qingyu, et al., 2023),以及對長篇文檔整體翻譯能力的研究(Wu, Minghao, et al., 2024)。此外,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對翻譯實踐模式的深刻變革(馮志偉、張燈柯, 2024),涵蓋技術反覆運算、業態重構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王華樹、張成智, 2025),同時也關注其對譯員培養、人才儲備和管理理念的深遠影響。

當翻譯的工具屬性逐漸成為翻譯研究的第一性時,翻譯的價值屬性、人文屬性遭到了冷落。學者們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問題,並展開了對翻譯研究中價值理性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語境下的倫理和生產制度方面。例如,有研究關注人機互動翻譯中不同主體的責任邊界問題,以及機器翻譯中的價值倫理問題(王華樹、劉世界, 2022)。在生產制度方面,研究重點在於如何在 NMT 和 LLMs 盛行的市場環境中規範翻譯流程和成果(王贊、張政, 2022)。亦有研究關注譯者在機器翻譯互動中的體驗和多元化價值(Ruokonen & Koskinen, 2017),呼籲以人為本及對人文精神的回歸(羅迪江, 2022)。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局限於經驗性記錄,較少從學科框架的視角進行系統的傳承和拓展。

通過諸多對人工智能驅動下翻譯行為的研究,我們看到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存在失衡的現象。首先,在對 NMT 和 LLMs 的運用中,對工具理性的使用幾乎完全淪為人對機器性能的補足;而未能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去反哺人類的學習經驗,從而開拓出新的研究範疇和方向。其次,對價值理性回歸的呼籲過於集中在倫理以及規範性方面,而忽視價值理性存在於社會及人類有機的、整體的、多元互動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失衡,是導致人類翻譯從業者價值感喪失的根源。

二、勞動的異化與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的失衡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失衡並不是人工智能時代才出現的問題,而是一個現代性的根本問題。要理解當前社會對人工智能的恐慌、對技術中心論的抗拒,以及對人文價值的呼籲,應回到這組對立概念的定義、



歷史、發展中去。

西方自啟蒙時代以來就開始崇尚理性，因為理性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規律，促進了科學和生產的發展，增強了人對自己的信念。基於理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又提出「(合)理性」概念(rationality)，並將(合)理性分為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工具理性指通過實踐確認工具或手段的有效性，從而服務於人的某種功利目的。而價值理性，則強調「目的、意識和價值的合理性」(陳振明,1996:4)。

現代社會對工具理性的過度依賴導致了現代性危機——前現代社會賴以依存的對社會的統一性解釋瓦解了，即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馬克斯·韋伯,1998:48)。一系列問題出現了，如隨著宗教世界世俗化帶來的精神家園和終極價值關懷的喪失(ibid.)；如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和人們精神的空虛，逐漸形成的「商品拜物教」成為新的「魅」籠罩於社會之上(卡爾·馬克思,1995:274-275)；如文學、藝術、手工勞動、知識生產者的光環隨著宗教的光環一起破碎，成為資本市場上的商品以明確的價值得以流通交換(ibid.)。

現代性危機貫穿了四次工業革命，而當下社會對人工智能的追捧造成的「智能拜物教」現象，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現今時代的衝突呈現模式(周露平,2021)。第一次工業革命讓工具成為人們身體的延伸，第二次工業革命改變了腦力和體力勞動的生產比例，第三次工業革命整合了人類的資訊和生產，而第四次工業革命，即當前的人工智能革命，讓生產工具成為特殊的「魅」凌駕於人的主體意識之上。在翻譯領域，無論是 NMT 還是 LLMs，都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運行，該架構雖然極大地提升了翻譯效率，但也使得翻譯過程成為一個難以解讀的「黑箱」。譯者並不知道這個過程中的具體運算方式，只能在譯前、譯後做出符合一定標準的編輯和修改。傳統的翻譯行為成為效率低下、徒勞無功的行為。本應成為人類助力的工具，卻成了人類主體性危機的來源。

工具理性盛行背景下的人類主體性危機如何解決？如何讓人工智能為人類的幸福和長期可持續發展服務？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後現代有機論「返魅」(re-enchantment)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方向。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工具理性已變成社會組織的原則，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了人與物的關係，主體-客體關係發生顛倒。若要打破這種顛倒，就應讓理性突破技術效能的局限，恢復其最初的「解放功能」，讓關注點回到人的本質，以及在一定技術條件下人的價值、自由、幸福和潛能的實現(赫伯特·馬爾庫塞,1995:314-363)。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認為，工具理性審視下的自然是割裂的，需要採取有機論及生態的視角對世界觀、自然觀進行重構(大衛·雷·格裡芬,1995:43)。工具理性護航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得到關注，成為新的價值和目的。

回到翻譯領域，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在人工智能的語境下為譯者及翻譯學科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我們要正確面對翻譯生產領域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衝突，也要更深刻地理解現代翻譯學科發展中這對矛盾的呈現方式及其平衡之道。

三、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在現代翻譯理論中的滲透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動態制衡幾乎滲透在了所有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範疇之中。在翻譯學領域，這組矛盾首先體現為本體論分歧——翻譯既是依附原作的複寫，又是具有獨立價值的符號實踐，而這一分歧直接關係到翻譯單位與研究範式的界定。同時它更是引發了目的論爭議——翻譯究竟應服務於資訊傳遞的效率最大化，還是應追求跨文化理解的倫理價值？

回顧翻譯思想史，翻譯的本體似乎從來都是以「工具」的形式被定義。這既源於其作為原作衍生生物的「第二性」本質，又因為它是跨語言資訊傳遞的重要方式，是為實用目的所服務的。不論是在中西方早期對

宗教經典的翻譯中,還是在世界各國的貿易通商往來中,我們都看到這種工具性的凸顯——涉及形、音、義等層面的跨語言轉寫的經驗被記錄下來,為後人提供參考。前現代譯論和現代譯論關鍵差異,恰恰在於後者通過工具理性驅動的系統化、學科化進程,將上述語言轉換經驗昇華為可複製的學科概念、框架和程式。

二十世紀見證了現代翻譯學科的成形,具體表現為對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現代研究方法的引入。1970年代以前,這些現代的研究方法主要從現代語言學遷移而來。現代語言學重新劃分了語言學的描寫範疇,定義了語言和言語,確立了最小的語音單位、語法單位,出現了以轉換生成語法和功能語法為代表的新的語法描寫方式。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也隨之出現了,如基於比較語法、形式語法的研究方式。在翻譯學科的發展中,我們發現了對科學理性的訴求。奈達著名的《邁向翻譯的科學》(*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Nida, 1964)一書直接出現了「科學」二字,創造了基於語義學、語用學和轉換生成語法的對等理論。而1970年以後,翻譯發展更多地從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進行借鑒,引入了國家、機構等研究範疇,強調催生翻譯行為的社會文化背景、主體特徵,以及可以從這些因素所推斷出的翻譯現象、文化現象的可解釋性。

現代翻譯學的學科合法性建立於其形成了一套符合科學理性的系統化研究範式。1972年,霍爾姆斯(James S. Holmes)在《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中提出的分類框架,標誌著這一領域的重大理論突破。該框架將翻譯研究劃分為三大範疇:描述翻譯研究、理論翻譯研究、應用翻譯研究。該框架的核心價值不僅在於其分類學意義,更在於這三個領域之間的邏輯序列關係中體現出的現代科學的嚴謹精神。它將翻譯作為可分割的單位,試圖捕捉翻譯過程、成果和功能中的客觀事實,進而用理論歸納總結翻譯中的現象和規律,從而投入到翻譯應用中去,如翻譯教學、語法教學、翻譯批評和政策設定。圖裡(Gideon Toury)在霍爾姆斯的框架的基礎上,提出「描述性翻譯研究」(Toury, 1995: 10),本質上是延續了赫爾姆斯觀察-認識-歸納-推測-運用的學科整體邏輯,並且將後者框架中的原本較為宏觀的研究物件進行了具體、實體化落地。在後來的翻譯理論中,我們不斷看到類似的從抽象範疇到具體範疇的轉換,如斯內爾-霍恩比(Snell-Hornby, 1995: 32)對翻譯文本類型的劃分便是其中典型例證。

在這些對翻譯及翻譯研究的理性化、規範化進程中,學術界也出現了對價值理性的呼籲,主要表現為後現代、後殖民的翻譯批評。後現代理論解構了文本和文本的意義,認為意義存在及消解在傳播之中。而後殖民理論延續了這種去中心論的傳統,認為應該打破原文-譯文,西方-非西方,男性-女性等二元對立,在多元價值中尋找意義。這直接導致了對翻譯文本範疇的定義的拓寬,以及對翻譯研究本體的拓寬。翻譯研究可針對更多類型的文本,以及更加多樣化的人群的主體性、主體間性之上;不再拘泥於語法和功能的比較。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這一學潮奠基,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引領的「翻譯研究」學派將其發揚光大。而中國的「譯介學」(謝天振,2013)、「生態翻譯論」(胡庚申,2013)也是其中代表。對翻譯人文價值的呼喚,本質上是西方後現代有機論對工具理性的反撥,以及世界各國學者對走出西方中心主義、建立更全面廣博的翻譯理論體系的嘗試。

然而,人工智能、NMT和LLMs的出現暫時打破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翻譯研究中的平衡,對翻譯研究方法、理論框架的發展構成了挑戰。正如第一、二部分所述,工具理性再次獲得壓倒性關注,而對價值理性的探索尚未從倫理、價值觀以外的更廣泛的層面上展開。「倫理」是規範性的、制約性的、先驗性的;是獨立於經驗的知識。而價值理性還應包含對世界的統一性解釋的向度,以及人文精神甚至某種難以解釋的崇高感的回歸。若要在翻譯研究中更好地運用價值理性,則依然需要從描述性的、經驗性的體驗和過程中提取出人類具有共性的客觀特徵,達到主客體的統一。

四、人工智能時代價值理性的回歸與重建

在人工智能時代,翻譯理論的重建需要在研究方法、視角和範疇中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平衡。

一方面,應客觀看待工具理性的價值,避免盲目崇拜或排斥技術;另一方面,面對當前對工具理性的傾斜,需找到價值理性發揮的著力點,以整體、有機的視角去發掘其多元意義。

首先應重塑翻譯研究中以技術為中心的視角,這不再是「智能拜物教」式的對技術的追捧的狂歡,而是用理性的眼光去審視語言、翻譯與人工智能的關係。我們不必因翻譯的從屬性或「第二性」而悲觀,擔憂者主體性的消解;相反,應認識到語言與翻譯的工具性本質——它們是人類為特定目的服務的媒介,而非全然站在主體性的對立面。人類通過思維認識世界,以語言為載體記錄知識,並通過翻譯實現跨文化傳播。在這一過程中,技術與語言的互動始終存在。正如庫茲韋爾指出「人類的語言一直在進化,各種形式的技術也一直在進步。結合不同時期的不同語言形式,技術為人類提供了與時俱進的方法來記錄和傳播其語言」(雷·庫茲韋爾,2016:15)。技術的進步催生了新的語言形式、記載與傳播方式,甚至重構了翻譯的研究范式。這種動態演化並非對人類主體性的剝奪,而是主體性通過技術媒介的延伸——人類始終是技術工具的創造者與駕馭者。

承認工具理性在翻譯研究中的關鍵地位,尤其是其對效率優化和標準化的推動作用,能夠使人工智能在翻譯生產中實現效能最大化,從而推動翻譯領域的生產力發展。其合理性主要基於以下兩點:其一,在知識經濟時代,語言服務作為生產鏈的重要環節,其效率直接關係到資訊傳播效能。神經網路的機器學習效率遠超人類,因此,通過人機協同優化模型性能以提升翻譯效率,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律。其二,人工智能的認知模式,如大規模資料歸納,可以反哺人類的理性能力,為人類提供新的分析視角,輔助修正認知偏差,推動智能協同進化。例如,機器翻譯的可解釋性研究與黑盒結構視覺化,正是通過揭示人工智能決策邏輯來促進人類對語言規律的再認識。

在翻譯研究中重建價值理性的主導地位,則需超越行業倫理的技術性討論,轉向對人類經驗多元性的重構與人文獨特性的尊重,實現技術時代的精神「返魅」。這一過程的本質,是在對抗工具理性對翻譯藝術的祛魅。在此過程中,理論建構需以本土文化價值體系為根基,回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需求。同時,可重新引入前現代性中的「靈韻」(aura)以及原真性、不可複製性等概念(瓦爾特·本雅明,2022:5-14),通過對翻譯主體的存在論反思,揭示機器翻譯時代勞動的詩性維度。

國家意識形態、價值觀,以及社會發展趨勢引領著翻譯實踐和理論構建。我國人工智能政策始終強調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推動智能化進程,全面提升社會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國務院,2017)。相關政策明確指出,人工智能的發展應遵循人類共同價值觀,尊重人權與根本利益,促進經濟、社會及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例如,《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構建「知識群、技術群、產業群互動融合的生態系統」(ibid.);《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2021)。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監管層面進一步規範人工智能發展(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2023)。這些政策檔共同構成了以人類福祉為導向的翻譯理論建設指導框架。

在人工智能語境下重新審視翻譯勞動主體,能夠有效拓展翻譯研究的理論邊界。傳統工業社會中,如徹斯特曼(Chesterman, 1997/2016: 65)所述,譯者本質上是通過出售翻譯勞動力和完整工作時間換取貨幣報酬的職業群體。然而,在NMT、LLMs、互聯網平臺與翻譯產業化多重變革下,這一定義已難以涵蓋當代翻譯實踐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體現為兩個層面:其一,專業譯者的工作場域已從單一文本轉換擴展至人機協作的品質控制與風格調校;其二,還湧現出愛好者自願翻譯、網路協同翻譯等新型實踐形態,其動機體系與價值評估標準均超越傳統經濟交換範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神經機器翻譯的普及催生了「人人皆譯者」的現象——任何具備設備接入能力的個體都能通過修改機器輸出參與翻譯過程,而終端使用者的回饋行為亦構成翻譯勞動的新維度。這些群智協同模式下的人類行為,其感性認知基礎、理性決策機制與社會文化



影響,亟待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對人工智能時代翻譯勞動本質的再思考,將為翻譯理論開闢新的認識論維度。當代翻譯研究已不能僅局限於語言符號轉換的技術分析或市場導向的策略研究,而需回應技術解放帶來的本體論變革。在神經機器翻譯接管基礎性翻譯工作之後,人類譯者獲得的不僅是馬克思所指的「自由王國」(卡爾·馬克思,2004: 928-929),更是創造性勞動的複歸可能——這種自由具體呈現為對文本詩學價值的深度開掘,以及翻譯過程中沉浸式的審美體驗。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機械複製時代「靈韻」消逝的憂思,當前學界關於AI無法替代文學翻譯的論斷,其本質是對前現代勞動中主客統一性的召喚,而這正是數位時代的辯證性「返魅」。當機器承擔翻譯勞動的初始階段,人類譯者得以在標準化生產之外,重新培育其經驗的異質性與事件的獨特性,實現人文精神的當代重構。更具理論意義的是,現象學詮釋學等傳統人文學說,可為機器學習的黑箱提供理解模型,推動人工智能的可解釋性研究從技術維度邁向存在論維度。

將人工智能、人類智能、人類經驗進行多維度互鑒,能夠更大程度地促進跨學科發展,實現新文科建設目標。以有機、動態、連接的方式看待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在翻譯中的作用,用工具理性解放社會生產,用價值理性引導人文關懷,可以更好地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

五、結語

神經機器翻譯的發展讓我們意識到翻譯行業和翻譯研究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失衡。本質上,這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它存在於現代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呈現出不同的具體形態。在翻譯學科的發展譜系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動態博弈既塑造了霍爾姆斯式的科學化研究範式,也催生了後殖民翻譯理論對多元主體性的呼喚。它牽涉到了翻譯的研究範疇和方法,以及翻譯本體、主體的不同定義。當前,翻譯研究領域的任務是人工智能驅動下的翻譯進行觀察、梳理、闡明、回饋、引導。既要理性審視技術效能,避免陷入「智能拜物教」;更要通過現象學、批判理論、自主創新理論等路徑,重構翻譯的創造性維度。具體而言,應在經驗層面記錄人機協作模式,在理論層面整合技術批判與人文視角,在實踐層面融合「以人為本」的行業願景。唯有如此,才能使翻譯學科在技術變革中既吸收創新成果,又守護人文內核,最終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動態平衡。

注釋

- ①「生產的抽象化」的概念可溯源到黑格爾,他認為機器和自動化體系讓生產成為人類無法控制的過程。黑格爾(著):《法哲學原理:或自然法和國家學綱要》,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頁229-230。
「異化」是馬克思哲學體系中的重要概念,後由法蘭克福學派發展傳播。本文沿用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中的概念,認為資本市場和自動化生產讓勞動者的勞動成為單調、無意義的,而不是充滿創造力的。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頁50-63。

參考文獻

- ① Belinkov, Yonatan, et al. (2017). What do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models learn about morphology? arXiv preprint arXiv: 1704.03471.
- ② Chesterman, Andrew. (2016).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 ③ Hahn, Michael, & Marco Baroni. (2019). Tabula nearly rasa: Probing the linguistic knowledge of character-level neural language models trained on unsegmented text. *Transa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7, 467-484.



- ④ LU, Qingyu, et al. (2023). Error Analysis Prompting Enables Human-Like Translation Evaluation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 Case Study on ChatGPT. arXiv preprint arXiv:2303.13809.
- ⑤ Nida, Eugene Albert.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 ⑥ Ruokonen, Minna, & Koskinen, Kaisa. (2017). Dancing with technology: Translators' narratives on the dance of human and machinic agency in translation work. *The Translator*, 23(3), 310–323.
- ⑦ Snell-Hornby, Mary. (1995).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 32.
- ⑧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⑨ WU, Minghao, et al. (2024). Adapt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Document-Level Machine Transl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2401.06468.
- ⑩ 陳振明:《工具理性批判——從韋伯、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求是學刊》,1996年第4期,頁4-9。
- ⑪ 馮志偉,張燈柯:《人工智能中的大語言模型》,《外國語文》,2024年第3期,頁1-29。
- ⑫ 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國發[2017]35號),(2017-07-20)[2025-05-1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 ⑬ 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令.第15號),(2023-07-13)[2025-05-10]. https://www.cac.gov.cn/2023-07/13/c_1690898327029107.htm.
- ⑭ 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範》,(2021-09-26)[2025-05-10]. 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109/t20210926_177063.html.
- ⑮ 胡庚申著:《生態翻譯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 ⑯ 卡爾·馬克思(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頁274-275。
- ⑰ 卡爾·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頁928-929。
- ⑱ 雷·庫茲韋爾(著):《機器之心》,胡曉姣,張溫卓瑪,吳純潔(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頁15。
- ⑲ 劉洋:《神經機器翻譯前沿進展》,《電腦研究與發展》,2017年第6期,頁1144-1149。
- ⑳ 羅迪江:《翻譯研究中的價值理性與人文精神》,《外語學刊》,2022年第2期,頁42-47。
- ㉑ 馬克斯·韋伯(著):《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頁48。
- ㉒ 赫伯特·馬爾庫塞(著):《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瑪律庫塞文集》,李小兵(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頁314-363。
- ㉓ 大衛·雷·格裡芬(著):《後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馬季方(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頁43。
- ㉔ 瓦爾特·本雅明(著):《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頁5-14。
- ㉕ 王華樹,劉世界:《大資料時代翻譯資料倫理研究:概念、問題與建議》,《上海翻譯》,2022年第2期,頁12-17。
- ㉖ 王華樹,張成智:《GenAI時代的翻譯實踐模式:技術反覆運算、業態變革與趨勢展望》,《外語教學》,2025年第1期,頁53-58。
- ㉗ 王贊,張政:《數位化時代機器翻譯的風險審視及控制研究》,《中國翻譯》,2022年第2期,頁109-115。
- ㉘ 謝天振著:《譯介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
- ㉙ 楊豔霞,陳瑩,魏向清:《生成式智能時代的人機協同翻譯素養研究》,《上海翻譯》,2025年第1期,頁39-45。
- ㉚ 周露平:《智能拜物教的哲學性質與批判超越》,《哲學研究》,2021年第8期,頁41-50。